

「反介入」，歷史的教訓告訴了我們甚麼

原文名稱：ANTI-ACCESS, Lessons from the Past

資料來源：取材自美海軍學院會刊(Proceeding)，雜誌2013年12月版

作者：古原俊井博士 Dr. Toshi Yoshihara

譯者：程永光上校 Translated by: Capt. Simon Y. G. Cheng

提 要：

- 一、日本帝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針對美海軍的作戰計畫，和當代中共的海上「區域拒止」的戰術思維，兩者之間存在著極為顯著的相似性。
- 二、中共在亞洲周遭海域上不斷迅速發展的海上力量，已引發周遭國家的焦慮，並試圖從歷史上尋求類似教訓的根源。尋找這個問題答案的最大因素，就是北京方面逐漸發展的「反介入」及「區域拒止」的戰略指導及能力——亦即眾所周知其將以軍事力量，希冀阻滯美國在亞洲海域的軍事行動。
- 三、1990年代迄今的北京當局，和當時的東京，均致力於發展特定的軍事選項，以嚇阻(或至少能擊敗)美國在其後花園的干預行為。雙方時空縱使相隔超過80年，但是兩者之間對於如何增加對美作戰的勝算，日本帝國海軍(IJN)及中共海軍(PLAN)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作戰思維。
- 四、當時的東京及現在的北京均有相同的共識，一致認為他們的國家將無可避免地自其弱勢的基礎上對美展開攻擊。渠等共同的信念，為於其各自的年代能夠對美海軍的主戰艦——無論是主力艦或航母——展開毀滅性的攻擊，是贏得海上戰爭的最重要的保證。該作戰概念的目標為「損小、效高」，套用五角大廈的術語：中、日兩國均計畫對美國採取「不對稱作戰」。
- 五、雖然美國擁有令人震懾的海軍實力，可是必須艱辛橫越廣大的海洋朝東亞行進，增加了美海軍艦隊龐大的後勤負擔。越是接近敵軍的領土範圍，越是增加了補給和維修的困難，通訊交流的管道更加狹隘。相反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的防禦力量，受益自鄰近後方可支援其持續戰

Reprinted from Proceeding with permission; Copyright©2013 U.S. Naval Institute/www.usni.org.

本文已獲Proceedings雜誌授權刊出。

「前進」雜誌，"Proceedings"，2013年12月號，Vol. 139/12/1,330，美海軍學院，頁26-31。

力的基礎設施，這地理上的不對稱，成為他們戰略發展的核心。

六、二戰時的日本帝國海軍，以及過去十年的中共海軍，均基於這種的戰略指導方針，來發展其所需之武器及作戰準則。希在此戰略指導下，中日雙方海軍的水下、水面及航空兵力能在戰場上的各個層面，找到美海軍的兵力位置，並主動求戰，以達成全面削弱美海軍戰力的目的。

關鍵詞：反介入及區域拒止、以攻代守、反干預戰略、不對稱作戰、地理上的不對稱、襲擾戰略、漸進式削弱敵戰力、截擊作戰、近海積極防禦

Abstract

1. Imperial Japan's plan for fighting the U.S. Navy before World War II and contemporary China's maritime area-denial tactics share remarkable similarities.
2. 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 in maritime Asia has been sufficiently worrisome to occasion just such a search for lessons in the past. The greatest stimulus for this inquiry is Beijing's emerging "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capabilities—broadly understood as military forces arrayed to complicate or deny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Asian waters.
3. Tokyo then, and Beijing since the 1990s, struggled to develop military options that would deter (and failing that, defeat) U.S. intervention in their backyards. Indeed, while more than eight decades separated their respective attempts at improving the odds of operational success,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JN)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PLAN) sought surprisingly analogous tactical outcomes on the battlefield.
4. The consensus in Tokyo and Beijing held that their nations would invariably fight from positions of weakness.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Japan and China relied on innovative doctrines, tactics, and technologies to give their nations a fighting chance. They converged on comparatively cheap and expendable weaponry that was lethal to highly-prized, capital-intensive American naval assets. This reflected the shared belief that land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capital ships of their respective eras—the

battleship and the aircraft carrier-held the most promise for victory at sea. The goal was to impose disproportionate costs on the adversary. In current Pentagon jargon, they planned to wage “asymmetric warfar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5.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possessed a formidable naval force, it had to slog across the vast ocean to reach East Asian waters, imposing enormous logistical burdens on the U.S. fleet. The closer it neared enemy territory, the more difficult re-supply and maintenance became as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tretched ever thinner. By contrast, Japan and China enjoyed the home-court advantage. As resident powers, they possessed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ir own neighborhoods. Japanese and Chinese defending forces also benefited from their proximity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located just behind them. This geographic asymmetry is centr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trategies.

6. To implement these strategies of exhaustion, the IJN then, and the PLAN over the past decade, developed weapons and honed doctrines that would cut the opponent down to size. Both services actively sought to engage the U.S. Navy in an attritional contest across the undersea, surface, and air domains.

Keywords: 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 Defense by Offense, Counter-Intervention Strategy, Asymmetrical Operation, Geographic Asymmetry, Strategies of Exhaustion, Progressive Reduction Strategy, Interceptive Operation, Near-seas Active Defense.

日本帝國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針對美海軍的作戰計畫，和當代中共的海上「區域拒止」的戰術思維，兩者之間存在著極為顯著的相似性。

戰略學者碰上了難以應付的政策挑戰時，通常第一反應都是先從歷史書籍中，尋求

答案或解決之道。中共在亞洲周遭海域上不斷迅速發展的海上力量，已引發周遭國家的焦慮，並試圖從歷史上尋求類似教訓的根源。尋找這個問題答案的最大因素，就是北京方面逐漸發展的「反介入」及「區域拒止」的戰略指導及能力-亦即眾所周知其將以軍

事力量，希冀阻滯美國在亞洲海域的軍事行動。當分析家回顧過往歷史時，許多人發現，日本帝國在1920～30年代期間的對美海軍作戰計畫，和中共目前的「反介入」戰略之間，有許多的相同點。

當時的東京，和1990年代迄今的北京當局，均致力於發展特定的軍事選項，以嚇阻(或至少能擊敗)美國在其後花園的干預行為。而且兩者之間對於後續該怎麼做，也幾乎達成相同的結論。中共現今在反介入的戰力發展上，和當時的日本計畫參謀之間的思維，具有令人驚訝的相似程度。縱使相隔超過80年，但是兩者之間對於如何增加對美作戰的勝算，日本帝國海軍(IJN)及中共海軍(PLAN)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作戰思維。

更進一步審視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發現透過這段歷史，可協助吾人理解中共現行的反介入計畫，並可以做為強有力的範例(佐證)，說明「反介入」對中日雙方皆有共同的吸引力的例證。以古為鑑，和一個在歷史上如此著名的對照組相較，可幫助我們深入瞭解中共在反介入作戰指導的努力成果，及揭開此一新穎詞彙之外層包裝的虛飾。同時吾人亦可看出中共於作戰上的偏好，及中共希望於海上達成之各個種類型式的戰術策略，和實際運用於作戰之影響成效。最後，以回顧的方式檢視帝國時代的日本，提供了讓吾人瞭解中共以「反介入」挑戰美國的重要性之參考。

然而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與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共，都有一個令其頭疼的問題。即雙方都面臨與美國發生海戰的可能性

，而且他們看似確定會輸，至少紙上兵推結果係如此。當時的東京及現在的北京均有相同的共識，一致認為他們的國家將無可避免地自其弱勢的基礎上對美展開攻擊。為平衡雙方的競爭基礎，日本與中共皆依賴創新的準則、戰術及科技，以期為他們的國家爭取一決雌雄的機會。

雙方皆擅長於作戰的技巧，故此提供一個超過其戰力規模的優勢條件。他們將資源集中在發展相對便宜且可消耗的軍備武器，以對那些具有高單價，且維持支出龐大的美國海軍資產造成致命性的威脅與傷害。這反映出渠等共同的信念，為於其各自的年代能夠對美海軍的主戰艦—無論是主力艦或航母—展開毀滅性的攻擊，是贏得海上戰爭的最重要的保證。該作戰概念的目標為「損小、效高」，套句五角大廈的術語：中、日兩國均計畫對美國採取「不對稱作戰」。

以攻代守

儘管美國擁有令人震懾的海軍實力，可是必須艱辛橫越廣大的海洋朝東亞行進，增加了美海軍艦隊龐大的後勤負擔。越是接近敵軍的領土範圍，越是增加了補給和維修的困難，通訊交流的管道更加狹隘。相反的，日本和中國大陸享有主場優勢。如同「地頭蛇」般，他們對自己的鄰近區域非常瞭解，日本和中國大陸的防禦力量，亦受益自鄰近後方可支援其持續戰力的基礎設施，這地理上的不對稱，成為他們戰略發展的核心。

就戰役層級而言，日本及中國大陸都陷入一個迷思，即最佳的防禦策略就是透過一

場精心策劃的戰術及作戰行動，以消滅美海軍的主要戰力。日本帝國海軍以「漸進式削弱敵戰力」為核心戰略，並計畫採取「截擊作戰」的方式，包含運用積極與重複攻擊的手段，以削弱敵艦隊的戰力。在這個作戰指導方案的影響下－直到1941年日本的基本作戰指導方針－日本的各型作戰載台，如潛艦、戰機、巡洋艦及驅逐艦等，當美太平洋艦隊之兵力朝日本前進時，這些兵力就會如同鐵甲武士般，阻攔美艦隊的去路。日本希冀透過這種連續作戰的方式，可以消滅美海軍三分之一的戰力。且一旦這種消耗戰的目標達成後，日本帝國海軍的真正主力打擊部隊才會適時地出現在戰力已大幅減弱的敵艦隊眼前，以進行一場決定性的殲滅戰。

雖然中共海軍極少表露其作戰及戰術內涵，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透過其「近海積極防禦」戰略，來探討其中的蛛絲馬跡，以瞭解中共會如何遂行海上作戰。「積極防禦」這個名詞，可以追溯至毛澤東時代，在1930年代其著名的游擊作戰軍事思維。毛澤東嘲弄被動防禦的想法，強調「只有主動的防禦作為，才是真正的防禦作戰」，他更進一步說明「防禦的目的是達到反制敵人攻擊，以取得攻擊之優勢」。對毛澤東而言，即使是防禦目標也最好以攻擊的手段取得。

「近海積極防禦」基本上承襲了毛澤東陸上作戰之精神，將其做為海上作戰與兵力發展之指導。的確，毛澤東自己也會接受中共海軍對其戰略指導之定義，以軍事術語解釋：「中共海軍將採取一切可能之作戰方式，不停的襲擾及殲滅來襲敵人」，在兵力運

用上「以具機動作戰能力之兵力搜索，並攻擊敵人，以逐漸改變兵力不平衡的態勢及戰略狀況，然後再掌握適當的時機，改採戰略性反制攻擊」。這種運用攻勢戰術手段的作戰思維，亦即削弱敵戰力，以取得可發揮致命的一擊的機會；和當時日本帝國海軍的「截擊作戰」概念非常相似。

二戰時的日本帝國海軍，以及過去十年的中共海軍，均基於這種襲擾式(或逐漸消耗式)的戰略指導方針，來發展其所需之武器及作戰準則，以求透過這種作戰方式能有效削減敵人的兵力數量。在此戰略指導下，中日雙方海軍的水下、水面及航空兵力均試圖在戰場上的各個層面，尋找美海軍的兵力的位置，並主動求戰，以達成全面削弱美海軍戰力的目的。

水下作戰

在水下的戰場中，二戰時期的日本海軍計畫運用其可遠距部署的潛艦艦隊，以截擊與限制美海軍的兵力行動。這些攻擊潛艦會單獨接近至戰場之最前方，並依美海軍的動態或前進路徑形成哨戒線。這些潛艦有可能對沿其戰線逐漸接近魚雷有效射程的敵人，採取伏擊戰術；或不斷採取截擊作戰或追蹤美艦隊各艦，直到將這些美軍進入日海軍主戰兵力預想之決戰海域。為達成此目標，日本帝國海軍建造可執行越洋作戰的潛艦，他們可以接近美西岸，並且可在該區執行任務達數週之久。

自1990年代起，中共已至少發展出四種新型核動力及傳統動力攻擊潛艦，後者在數

量上正大幅增加，且其整體技術也日趨精密複雜。這些新型水下部隊均具備於水下發射攻船巡弋飛彈(ASCM)之能力，這個能力對水面部隊而言是強而有力的威脅。

假設來襲敵軍艦隊之可能航線已可預期，這些潛艦即可在事前就攻擊位置，然後靜待適當的時機對敵實施伏擊。和主動尋殲敵人相比，於特定位置伏擊敵人的潛艦，較不易遭敵反潛兵力發現。再加上各種感應器的運用及目標定位系統之配合下，分散部署的中共潛艦得以採取多方位飛彈協同遠距攻擊，達成飽和攻擊與奇襲之效。

水面艦作戰

在公海上，日本海軍作戰參謀規劃由擅於隱匿行蹤之魚雷驅逐艦及巡洋艦之夜間作戰支隊，對美海上兵力奇襲。另為使武器射程優於美海軍，日本帝國海軍在其水面艦配備「長矛魚雷」。該型魚雷不論是射程及速度，均優於當時美海軍同等級之武器，並且該型魚雷使用氧氣動力魚雷，且該型魚雷之艦跡極小，使其在攻擊敵艦時較不易遭敵人發現。

利用夜暗的掩護，日本帝國海軍高機動性的戰艦，迅速的在美海軍海上艦隊尚未預期的情況下，攻其不備，且儘量運用協同及隱匿方式採魚雷飽和攻擊，在美海軍官兵心理造成恐慌、疑惑及混亂的心理。日軍認為其夜戰能力，可以彌補其在白天與美海軍艦隊接戰的劣勢。在1942~1943瓜達康奈爾戰役期間，日軍對美軍的不斷地實施夜間攻擊惹火了美海軍艦隊，迫使其創新戰術，給日

軍上了堂極有價值，但時間很短的課。

與日本帝國海軍的輕型魚雷載台兵力相較，中共擁有一隻數量龐大的快22艇，河北級快速飛彈攻擊艇，該型艇配備遠距攻船巡弋飛彈、匿蹤、船體小且可以破浪高速行駛的外型設計，使其可以在遠海對敵展開奇襲，目前已有約100艘該型艇加入中共海軍服勤。如此中共可以妥善規劃部署其兵力，以充分協調與策劃飽和飛彈攻擊，以突破敵艦隊之防禦網。

岸置空中兵力

卓越成熟的航空科技使得日本可以直接從岸上影響海上事務，三菱公司生產之G3M及G4M為當時世界頂尖的兩型岸置打擊轟炸機，使得日本帝國海軍能力向前推進了數百哩之遙。當時世界上，這兩型岸置海洋打擊轟炸機在速度及作戰半徑方面的性能，鮮有敵手可與其匹敵。因此，日軍利用其所佔領之太平洋各島礁之前沿設置前進基地一如馬里亞納、卡羅林以及馬歇爾群島等—這些基地位置使日本海軍航空隊得以對即將來襲之美太平洋艦隊執行深入襲擊。

在戰爭早期的前幾個月，日軍轟炸機完全主宰制空權，險惡的敵軍以橫跨亞洲海域為目標。尤其是取得一次戰術上的重要勝利，即日本海軍自中南半島起飛的轟炸機，在南海上擊沉了英國兩艘軍艦：皇家海軍威爾斯王子號(HMS Prince of Wales)及無敵號(HMS Repulse)。這次英國海軍的挫敗，首次證明岸基空中兵力，亦可在開闊海域擊敗海上作戰艦。

惡名昭彰的日本神風特攻隊，展現出其以岸基空中兵力，抵抗海上武力的潛在效率。神風特攻隊在功能上等同空射型的導航巡弋飛彈。以其殺傷力而言，在硫磺島的戰役中，日軍的神風特攻隊給美海軍令人膽寒的損失。總計在兩個月餘的時間，日本擊沉或重損的盟國水面艦超過120艘。隨著戰爭逐漸接近尾聲，為迎擊預期來襲的敵人。日本海軍已準備好約5000架之神風戰機，屆時數以千計的人力巡弋飛彈，將如雪片般落在美軍兩棲登陸部隊的頭上。

跟日本一樣，中共亦投資建構新型岸置防空打擊武力。至於制定那些海軍的防空（或空中攻擊）作戰能力，以及提升舊型、發展新型的防空武器及系統（如神盾），目前中共有多種岸置定翼機，均具備投射攻船飛彈之能力。中共海軍之空中兵力如今已屬世界一流。值得注意的是蘇凱州MKK多功能戰機及轟六型中程轟炸機，已可威脅在第一島鏈以東海面巡弋之水面艦船。這種具備海上打擊能力之戰機，配備長程攻船巡弋飛彈，以編隊方式出現時，將可以集中打擊火力，貫穿敵艦隊之防禦網。

中共的二砲部隊之攻船彈道飛彈，係一種可操控飛行彈道之飛彈，並具備擊中海上移動目標之能力，這個武器恐怕已是岸置火力的終極科技展現。據說此型飛彈射程將超過800哩，這些車載發射的飛彈，連同水面艦載及潛射型攻船飛彈，儘管不能確切知道他們是否真如其宣稱般的威力強大，但是仍顯示中共盡一切力量發展各種打擊敵人水面部隊選項，以阻滯敵人水面艦隊的接近與削

弱其戰力。

研擬並確認反介入戰略執行的步調

為強化且有效執行反介入之作戰邏輯，日本和中共都設下層層疊疊的關卡，兩者都希望透過這種襲擾式戰略思維，可使美艦隊抵達西太平洋前，就已兵疲馬困。在初始階段，日本帝國海軍及中共海軍需遂行遠距作戰，盡可能愈接近美國本土遂行截擊作戰愈有利。當美艦隊反擊，且層層突破其封鎖線時，這兩國會不斷的視狀況退居下一道防線，同時派遣及投入更多兵力及武器。當對手愈接近，美艦隊將遭到更為激烈的阻力，及更高密度的攻擊，以加速對美海軍艦隊的消耗率。

日本帝國海軍及中共海軍都期待能達成非常類似的戰術目標，即日本與中共都想藉由隱匿其部隊行蹤之後，運用其水面和水下兵力，對美海軍實施出奇不意之攻擊。雙方皆認同以魚雷及飛彈的飽和攻擊，將可有效摧毀美軍艦隊的防禦。最後，日本及中共都花費大筆預算發展具尖端科技的武器，使其打擊能力優於對手。很顯然，不論是空中兵力或導彈，皆讓其有能力在美海軍艦隊之打擊能力接近敵人海岸展開報復行動前，將戰火直接從陸地投射到美海軍艦隊。

中日雙方不同處…

不可能從歷史上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案例來做對比，但是從過去的案例分析中，可以讓我們得以洞悉中共反介入之作戰思維，

和日本帝國海軍將美國摒除在其大東亞共榮圈所採取的戰略差異處。其中有一點的不同需特別注意，因為它讓中共有些微的機會得以獲得勝利。

在作戰能力上，日本帝國海軍對美海軍而言是可怕的夢魘。日本自恃其擁有一支足以主宰亞洲海域訓練精良、戰力均衡的艦隊。在戰術上而言，日本海軍的武器的確可列為世界頂級的行列，三〇年代的中日戰爭給予日本皇家軍隊實戰的洗禮，也提供其實施武器測試與修訂準則、教範的依據。也因為從這場戰爭，讓其可預見終會有一天，雙方強大、旗鼓相當且均擁有先進科技的戰鬥艦隊將在海上一決雌雄。

相對於日本帝國海軍而言，中共海軍目前在東亞充其量也只是個地區強權，尚無能力執行遠距離兵力投射及維持長時間作戰的能力。雖然其現代化武器及裝備的比例不斷增加，但許多過時老舊的載台是其海軍的沉重負擔，中共海軍仍在美海軍後面苦苦追趕。且中共的軍隊自1979年之後，就再也沒有和其他國家打過仗。因此，無論是作戰經驗或武器系統性能、科技，海上作戰之戰術運用，中共海軍均非與美海軍能比。中共海軍還需要很多年，才能真正具備遠洋作戰能力，倘若他們真的希望有能力與美海軍在大洋上捉對廝殺。

就現階段而言

雖然如此，就長期而言，北京的處境要比日本更容易達成其更大的戰略目標，這得歸功於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中共的反介入戰

略及通用作戰部隊，將會以日本帝國大本營裡的指揮官及高級幕僚作夢也想不到的速度，在質和量上大幅成長。在一場可能曠日廢時的戰爭裏，中共武裝部隊後面龐大的工業能量，將提供中共海軍大量的補充戰力，這是日本帝國海軍從未享受過的優勢。

日本的經濟狀況在美國自「大蕭條」中逐漸恢復後，就顯得岌岌可危且面臨惡化的威脅。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美國經濟實力及工業生產力，分別是日本的12倍及10倍。我們從戰爭期間的海軍建設即可見分曉。在西元1942～1945年間，美造船廠生產的戰艦總噸數是日本的5倍大。

從另一方面看，中共經濟體在2012年時，約是美國的一半大。倘若依目前其經濟成長率繼續發展，「中」美之間的鴻溝就會更進一步萎縮。中共現在已具有較當時的日本大得多的工業及物資基地。目前中共已是世界上最大造船國之一，且正以令人咋舌的速度不斷製造各型戰艦。簡言之，日本從戰爭一開始就注定將落後美國，然而中共將減低美國在戰爭物資供應的優勢。

將反介入轉化為成功的戰略

最後，日本最終戰敗的原因，提供了中共反介入戰略的重要啟示。首先，日本的高科技無法在整個太平洋戰爭中，彌補其戰略上的失敗；另外，日本沒有在西太平洋島上適切構建前進基地或基礎設施，俾供岸基戰機及潛艦停靠，使得日本的消耗戰略失敗。其次，再精良的武器，若無正確的教範指導，亦無法保證作戰成效，比如說世界一流的

日本潛艦，由於戰術上的瑕疵，互作戰全程幾乎完全沒有戰果。華而不實的紙上談兵，不能保證在實戰中可以獲得預期的效果。這些教訓也同樣讓中共海軍注意到這個問題。

但是太平洋戰爭的結果，並不表示中共的反介入戰略會失敗，畢竟，太平洋戰爭的幾個主要轉捩點，包含中途島及瓜達康耐爾兩場大戰役，雙方的戰果差距不大，美軍贏得驚險；倘若在其中任何一場戰役中，日本海軍要是運氣好些，戰局結果可能大不同。縱使美海軍佔盡優勢及好運，仍然花了30個月才打贏這場艱苦的戰爭，摧毀日本所構築的反介入防線。

即使是一個有重大缺陷的作戰計畫，也讓日本在戰敗前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隨著戰況發展，過程和結果一樣重要，至於中共是否會避免重蹈日本帝國的覆轍，又或是中共

海軍將最大化地運用其海軍及各類武器以獲得最佳結果的問題。假如北京有從歷史上學到教訓，其必須再強化反介入的層層防線。當有關中共戰略討論持續進行時，將會使戰略學家將歷史書隨時備便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作者簡介：

古原俊井博士目前任教位於新港，羅德島之海軍戰爭學院，為該校之亞太關係研究與戰略課程教授。他和該校何姆斯教授合著「星條旗橫越太平洋：中共的崛起及其對美國海洋戰略之挑戰」一書，由美海軍學院出版，被列為美海軍專業閱讀計畫之必讀書目。

譯者簡介：

程永光上校，海軍官校83年班，美維吉尼亞軍校1995年班，現服務於海軍官校。

老軍艦的故事

萬安軍艦 AP-523



萬安軍艦為交通船。民國66年基於外島人員物資運補需求，由後勤司令部負責該艦建造事宜，民國66年6月30日由海軍後勤司令部司令劉玉光中將代表與中國造船公司簽約，民國67年5月5日安放龍骨，同年7月22日由總司令鄒堅上將主持下水典禮，民國68年1月17日舉行海上測試，民國1月26日由副總司令林蟄生中將主持命名成軍典禮，命名為萬安軍艦。編號為AP-523號。成軍後隸屬勤務艦隊，負責外島人員物資運補任務。

該艦因海損嚴重，於民國87年1月16日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